

閔宣化與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

[比利時] 鄭永君

[提 要] 在 20 世紀五十年代之之前,比利時與漢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始終是以赴華傳教士為紐帶而逐漸形成的。因此,作為 19 世紀以降比利時赴華傳教士的主力軍、被譽為“中國苗圃”(Seminarium pro Sinis)的聖母聖心會,在中比學術交流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該修會的傳教士們在漢學研究領域所做出的成績,不僅得益於其在地域上“如魚得水”的優勢,而且他們在赴華之前所接受的長達六、七年的漢語培育,也為他們更深入地進行漢學研究創造了先決條件。聖母聖心會展開對漢語的學習歷經了一個長時期的演變和發展,其中心人物則是該會傳教士閔宣化,他不但在數十年之中推動了該修會內部成員的整體語言水平,更重要的是一系列以荷蘭語撰寫的漢語語言學專著也相應地孕育而生,這些著作直接影響了該修會以至整個荷語界漢語教育的發展。

[關鍵詞] 閔宣化 聖母聖心會 漢語教育 荷蘭語

[中圖分類號] B979; K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1) 04 - 0103 - 09

一、聖母聖心會與漢語的早期接觸

在數世紀的中西交流史中,西方傳教士是重要的媒介。以明清耶穌會士為代表的有識之士,為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 世紀以降,工業革命的興起和生產技術的革新,推動了西歐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技術的提昇和殖民主義思想的擴張,不但讓西方列強把尋求利益的目光放眼到海外,也為新一代的“福音使者”拓寬了通往異國的道路。與此同時,剛剛經過法國大革命和獨立運動雙重洗禮的比利時,民族意識高度覺醒,天主教信仰在國內也因此全面復興。時任布魯塞爾軍事學校校牧的南懷義(Theofiel Verbist)及鋒而試、白手起家,經過數年的努力在 1862 年創立起該國第一個專門向中國輸送傳教士的團體——聖母聖心會。從 1865 年第一批四名傳教士入華到 1955 年全部離境,近百年中共有 679 位成員涉足中國。作為在華最大的比利時傳教群體,他們的足跡分佈在內蒙古、熱河、陝北、寧夏、甘肅、新疆、青海等地。直到 1948 年,仍有二百餘位會士在長城周邊生活與傳教。這個被譽為“中國苗圃”的天主教修會成為比利時有史以來最大、也是獨一無二的赴華傳教團體。^①

與明清之際在中國大地獨領風騷的耶穌會不同,鴉片戰爭之後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大多源自不同的修會。這些團體雖皆由羅馬教廷統一部署領導,但因每個修會的來源國、創會目的及創會者自身背景不盡相同,導致它們在國別特色、傳教策略以及學術研究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獨特性”。

以聖母聖心會的學術研究為例，該修會以說荷蘭語的弗拉芒籍傳教士為絕大多數，因此以本民族語言撰寫的學術著作頗為豐富，讓其它在華修會望塵莫及。^②又因他們的傳教區域地處中國西北以及塞外邊疆，因此對於蒙漢學術的推廣和研究也同樣有著卓越的貢獻。然而漢語語言作為傳教士進行在華傳教的必要工具，毫無疑問是首先需要攻破的難題。首批入華的四名聖母聖心會傳教士之一韓默理(Ferdinand Hamer)在其傳教生涯的第一年中就曾向南懷義呼籲過掌握漢語的必要性。^③

然而事與願違的是，在聖母聖心會剛剛起步的19世紀中期，他們並沒有足夠的條件，更沒有任何實際經驗為新加入的傳教士們提供漢語教育，甚至連最基礎的哲學和神學培育也只能依託於羅馬的傳信大學(Pontificia Universitas Urbaniana)或魯汶(Leuven)的耶穌會神學院。再加上當時漢語教材，尤其是口語教材的短缺，更讓這些初入中國的傳教士對漢語無從下手。另外，缺乏掌握專業漢語語言學知識的師資，也成為當時面臨的棘手難題。^④但這種捉襟見肘的情形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聖母聖心會在人力、物力以及管理經驗上的不斷發展，其在漢語教育方面也發生了積極地轉變。數十年的知識積累和經驗摸索，讓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體系逐漸走向正軌。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的領軍人物，毋庸置疑當屬來華傳教有22年之久的弗拉芒籍傳教士閔宣化(Jozef Mullie, 1886-1976)。而在中國學界，如果我們提及此人，想必首先會想到他的考古學著作《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這本著作曾被譯成中文單行本並多次再版，使閔宣化在考古學方面讓國內學者印象深刻。^⑤然而，自幼熱愛語言學的他，其一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則側重於漢語語言。他的第一篇涉及此領域的研究性文章《對北京以北方言語音的調查》(Phone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nordpekinischen Sprachlaute)早在1913年就以德文在《人類學雜誌》(Anthropos)上發表。^⑥閔宣化在聖母聖心會內近70年的學術生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見證並推動了該修會在漢語教育歷程上的演變和發展。

二、聖母聖心會漢語教學的起步

聖母聖心會在1862年11月28日正式創立之後，由於經費和人力的短缺，直到1877年10月才建立起第一所隸屬於自己修會的神學院，供會士們集中學習哲學和神學課程。而漢語教育的最初起點，則是在十年之後。1885年9月26日，聖母聖心會首次任命從中國返比的傳教士李崇耀(Albert Gueluy)在神學院裡開設漢語課。這所位於司各特(Scheut)的神學院雖然在1888年遷到了魯汶的弗拉芒街(Vlamingenstraat)，但其漢語課程並沒有因此而中斷，曾在甘肅傳教的丙存德(Adolf Van Hecke)後來接替了李崇耀的工作，繼續在魯汶教授了多年的漢語。^⑦

位於司各特的聖母聖心會雖然為當時比利時的漢語教育打開第一道序幕，但其在教學內容上的局限性以及教學方法上的單一性是不可否認的。^⑧據閔宣化回憶，當時的傳教士首先以漢字學習為起點，以熟練掌握明代梅膺祚《字彙》中的214個漢字偏旁為基礎，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學會查閱《康熙字典》等工具書來輔助自學。其次是以中文要理書、祈禱經文和白話聖經作為教材學習口語，早期使用的書籍有《一目了然》和《古經略說》，這些淺顯易懂的語文體書籍既是重要的傳教素材，也是易於理解的中文文本。^⑨當初對傳教士漢語上的要求也僅以口語交流為主，能夠向本地慕道群眾解釋要理，或對信教群眾公開證道為標準。而以語言學為指導系統地進行教學，當時還沒有出現。閔宣化這樣寫道：

對我們傳教士在那時的教育除了哲學就是神學。漢學這一學科在老一輩傳教士的眼中是不存在的。1903年時，漢語老師上課的第一句話就是“漢語沒有語法”。德國漢學家

甲柏連孜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早在 1881 年出版的語法書《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我們在司各特和魯汶也都從來沒有聽說過。^⑩

但隨著聖母聖心會在中國傳教的規模越來越成熟，男女公學、大小修院，培育本地傳教員和司鐸等工作又相繼提上日程，簡單的漢語口語顯然已經不能勝任於這些事務了。1905 年科舉制度廢除後，新式的現代學堂紛紛建立，白話文一躍取代了舊式“八股”，其“國文”地位隨之明顯提昇。聖母聖心會在這一“新舊文體交替時期”的中文老師是桑貴仁 (Karel Van Sante)，他也是閔宣化在魯汶神學院學習時期的中文老師。據閔宣化回憶，雖然自 1904 年至 1906 年期間桑貴仁仍沿襲前輩的方法，讓年輕的傳教士以研讀《一目了然》和《真道自證》來學習中文，但他後來卻革命性地使用了《官話指南》作為教材，這或許是聖母聖心會在漢語課程中所使用過的第一本正式的教科書。^⑪ 1920 年，為與時俱進，聖母聖心會決定從中國“引進”上海土山灣出版的《新式國文新課本》來教授漢語，這部“文白相間”的漢語教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司各特傳教士來華之前學習漢語的主要教材。^⑫ 然而，這一局面到 1931 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熱河傳教的閔宣化被總會召回比利時，專職負責修會在司各特初學院、魯汶神學院以及荷蘭奈梅亨 (Nijmegen) 神學院三地的漢語教學工作，聖母聖心會內部專業和系統的漢語教學時期自此開始。

三、閔宣化執掌漢語教學時期

閔宣化主導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任務，成為該修會在漢語教學歷程上的一個突破性轉折點。他不僅系統地安排課程，循序漸進地加以引導，並且在教學上也更強調遵循語言學的科學方法。他的學生賀登崧 (Willem A. Grootaers) 曾說，閔宣化在 1931 年至 1949 年執掌魯汶學習院的漢語教學期間，那裡可謂是弗拉芒地區的第一所“漢學學校”。閔宣化所培養的聖母聖心會傳教士多達三百餘位。在他的這些學生中間，有的成為北平輔仁大學的漢學教授，也有在萊頓、倫敦、紐約獲得博士學位的漢學專家。當時在歐洲沒有任何一個修會可以與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規模相媲美，其教學方法和投入的精力也走在同行前列。閔宣化曾坦言：“聖母聖心會對漢語極其重視，並且漢語教學在傳教士的培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我們曾是歐洲第一個能夠如此長期而系統地教授漢語的修會，到目前為止，很少有幾個修會能夠跟上我們的步伐”。^⑬

當閔宣化還在熱河傳教時，他已經對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情況抱有極大關注並進行了深入反思。在 1930 年 3 月的一封長信中，閔宣化把自己擬定的漢語教學改革意見提交給中國傳教區的省會長作為參考。他認為，學好漢語的根本目的是讓傳教士更能勝任在中國的傳教工作。這包括掌握熟練的口語能夠與當地人交談傳道；掌握足夠的文言知識以便主持當地的教會事務和教學；掌握簡單的中文書寫能力用來從事文字傳教工作。如果傳教士想在中國人中間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不具備以上的能力是很難達成的。而學好漢語的先決條件是應該有優秀的老師；其次是在不妨礙哲學和神學學習的前提下，增加學生們的漢語學習時間；再有就是教科書的選擇問題，能夠進入系統地語法學習是掌握漢語的最佳捷徑。因此，閔宣化極力爭取漢語教學在神學院中應有的重要地位，並且以建立一門專業漢學學科為最理想的目標，而廣泛地引進師資和合理地安排教學任務是建立一個完善學科的首要前提。^⑭

閔宣化的這封信或許是導致其返回比利時執掌中文課程的原因之一。但無論如何，他的到來確實為比利時母院的漢語教學帶來了極大的改觀。在聖母聖心會的檔案中，筆者發現一份閔宣化在 1947 年提交給總會長的漢語教學報告，其中記錄了 1935 年至 1947 年之間學生所學的內容和考

試成績。從其內容上大致可見，傳教士所接受的漢語訓練在口語和文言文上的學習比重基本持平。在教學上以白話口語為起步，但隨著年級的增長，文言文的比例也逐年增加。

在白話口語教材的選用上，從始至終重點使用的是“天主教國文”(Katholiek Kwo-wen)，即上文提到的《新式國文新課本》。這套在 1912 年 9 月民國政府教育部頒布“壬子癸丑學制”後誕生的教材，由上海聖教雜誌社編寫，內容多與教會生活密切相關。其前言中有如下介紹：

是書宗旨是為養成國民知識，灌輸公教真理，按照國民學校四年畢業年限編輯，每半年一冊，共八冊，每冊五十課，共四百課，用生字三千一百個……第一至四冊以單語及短文構成，使兒童即能自造短句短文；第五、第六冊另闢文法一門，使知文字之所以然；第七、第八冊則示以日用文章，……得此亦足自立，而無學非所用之弊。¹⁶

據閔宣化所述，“天主教國文”課本的第一、二冊用在聖母聖心會傳教士第一年的初學時期學習，第三、四、五冊在其後兩年的哲學時期學習，而程度較深的六、七、八冊則是在他們讀神學的四年中學習，這與原書所規定的半年一冊的學習進度相比有所放緩。

掌握漢語語音的重要性是閔宣化在漢語口語學習過程中一直重點強調的內容。“語音學”在學生第一年進入初學院起就要開始學習。閔宣化對中文發音的練習也力求遵循科學和系統的原則，避免“鸚鵡學舌”式的教育方式。“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教學理念一直是他堅持貫徹的方針。閔宣化始終認為，能夠快速地領悟漢語發音特點並且有效地掌握其發音規律，在學習方法上是很重要的。學生在漢語發音上遇到的困難完全可以通過語音學的知識加以改善。首先學生要了解自己母語語音的“調音”(articulatie)特點，然後再以一種“求同存異”的方法，把漢語中存在而荷蘭語中不存在的發音方式集中地加以學習和訓練。¹⁷為此，閔宣化在 1922 年出版了一部法文的專題著作《音學撮要》(*Notions élémentaires de phonétique et alphabet général*)，自創一套近似於“萊普修斯標準字母”(Standard Alphabet by Lepsius)的語音書寫系統來輔助學習和記錄漢語語音。¹⁸其後，他又為荷語母語者“量身制定”了一套荷語化漢語拼寫系統，在 1946 年出版的《漢學指南》(*Drie sinologische bijdragen*)一書中，首次對該方案做了具體介紹。¹⁹以上這兩本出版物成為當時司各特傳教士學習漢語語音的主要教材。此外，閔宣化或許是受到了早期聖母聖心會漢語教育的影響，他堅持認為學生在第一年掌握 214 個漢字偏旁是非常必要的，這是他們能夠獨立使用中文字典的首要技能。為此，閔宣化在魯汶撰寫了一本面對荷語母語者學習漢字偏旁的書籍《漢字的 214 個部首》(*De 214 sleutels van de Chinese karakters*)。²⁰

在文言文的學習上，初學階段的學生以研讀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的著作《教要序論》(1670)為起步。到了哲學和神學的學習期間，則開始陸續研讀儒家典籍《四書》以及耶穌會士顧賽芬(Sépaphin Couvreur)撰寫的《公文文選》(*Choix de documents*)。²¹閔宣化在講授古代漢語時，力求對其語法加以細緻地解析。²²此外，他又深信古代先賢的經典著作是中國思想文化形成的基石。因而除了學習《四書》之外，他又選取一些能夠代表中國主要哲學流派的其它著作，如朱熹、孟子和列子的作品。其目的是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還可以循序漸進地幫助學生了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和文化淵源，這將有助於年輕的傳教士在思想上儘快地做到因地制宜，在短時間內跨越東西思想之間的鴻溝。

中國悠久的文化底蘊是建立在其浩瀚的歷史基礎上，閔宣化對此也高度認同。他通過講授既有文學價值又有史學意義的《史記》，來向學生介紹中國從上古到漢武帝時代數千年來的人和事。他在課堂上還協助學生一起翻譯《漢書》(*Annalen der Vorstenhuizen*)，從中挖掘中國與西域之間早

期交流的歷史痕跡，具有敘事特色的史學著作《左傳》也是閔宣化推薦學生學習的文本之一。除先秦兩漢史學著作外，閔宣化又把近代地方誌書《承德府志》(1826-1887)加入到課程當中，其目的是讓學生熟悉與他們傳教目的地息息相關的地理、歷史和風土人情。他又與學生一起研讀具有方言口語性質的《邪正理考》(1907)，以“護教學”的視角來了解中國的民間信仰。²³可見，他在教學內容上的選材精良和豐富多彩。

在聖母聖心會母院學習漢語的最後一年裡，閔宣化要求傳教士們加強閱讀白話中文報紙的能力。他認為，20世紀初期出現的“新聞語”是一種介於口語與文言之間的現代語體，是在“白話文運動”影響下的一種重要文化現象，是書寫語言向大眾化轉型的表現形式。²⁴閱讀各種白話報刊不僅可以借助學生對中國時事的“好奇心”來激發他們的閱讀興趣，同時也能夠培養他們撰寫迎合新時代需要的中文文章和信件的能力。閔宣化一直堅信，雖然“白話文”在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階層中大行其道，但文言文對白話文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他要求傳教士們從第一年就要開始接觸文言文的原因，因為這會讓他們在日後閱讀中文報紙時有“輕車熟路”之感。在閔宣化的眼中，“新聞語”就是一種“簡化”(gereduceerd)後的文言文而已。²⁵

由此可見，閔宣化雖然名義上只負責傳教士的漢語語言課程，但他所講授的知識和安排的學習內容卻涵蓋了中國的口語、訓誥、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新聞傳播等諸多方面。他的這一教學宗旨不僅貫徹在聖母聖心會比利時的會院中，在荷蘭奈梅亨的會院中也同樣遵循。閔宣化的荷籍學生魏達恒(P. Verdagem)在1940年曾寫道：“得知您被烏特勒支大學授予漢語教席的消息後，我從心底裡為您作為我們的漢語老教授和修會東方學的領路人感到驕傲。您的漢語教學將要跨出我們修會這所‘全歐洲最大的漢語學校’而向外伸展。……毋庸置疑，我們知道您要求我們學生的不僅只是在中國的語言上下功夫，而且要一併掌握中國的歷史、民族學、地理、宗教和哲學。”²⁶

反觀前文賀登崧所言，稱閔宣化為弗拉芒地區開闢了第一所“漢學學校”的說法不無道理。每位聖母聖心會傳教士在赴華前的7年漢語學習經歷(初學期1年、哲學期2年、神學期4年)，不僅讓這些年輕的傳教士們能夠很快地融入到中國本土的生活當中，並且為他們日後的漢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難想像，為何在閔宣化的學生中會出現不少如賀登崧一樣的傑出漢學家，並且對他們的這位老師始終深懷感激。

四、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與閔宣化的漢語語言學著作

在閔宣化執掌聖母聖心會漢語教學的整個過程中，除大力推進修會內部的漢語教育發展外，另一更為顯著的成就則是他用荷蘭語編撰的漢語語言學著作。它們分別是在北京出版的《熱河方言文法》(*Het Chineesch Taaleigen*, 1930-1933, 共三冊)、後期在魯汶出版的《古文原則》(*Grondbeginselen van de chinese letterkundige taal*, 1947-1950, 共三冊)以及在荷蘭烏特勒支大學任教期間出版的《中國語初範》(*Korte Chinese spraakkunst van de gesproken taal*, 1947)。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語初範》是在《熱河方言文法》基礎上改編而成的一個縮略版本，同時也是對《熱河方言文法》做出的一個補充和修訂。²⁷

閔宣化始終呼籲，如果以科學而系統的語言學知識來看待漢語的口語和文言文，並以一種縝密的學術態度來考察漢字的真正含義，歐洲語言和漢語語言之間的聯繫將會逐漸建立，漢學家們也會更清楚地看到和理解中西語言之間存在的差異。然而，作為傳教士的閔宣化在語言學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其初衷不外乎是服務於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工作，他在《熱河方言文法》的前言中開誠佈公

地闡明了他以荷蘭語撰寫這本著作的首要目的：

這本著作的寫作目的是為了學習北京以北的方言。耶穌會士戴遂良的漢語著作有充分的理由可被稱為大師級的作品，並且對很多傳教士的漢語學習深有幫助，但這本著作的出版或許可以為其提供一些知識上的補充。然而，畢竟到現在為止，以荷語為母語的傳教士還沒有一本能夠以自己的母語來學習北京以北方言的書籍。荷蘭語作為一種與其它歐洲語言完全不同的語言，學生們不應該借助另一種外國語言來學習漢語，而最上乘的方法則是用自己的母語。因為，漢語與荷蘭語之間的語法關係可以更清楚地直接傳達，對學生們來說也會產生更深刻的印象。²⁸

關於《古文原則》一書的寫作目的，閔宣化在他的一篇手稿中這樣寫道：

（除了覺得文言文沒有用處），另一個無法讓聖母聖心會傳教士熱衷於學習文言文的原因是，他們認為文言文實在難學。但是，現在一部文言文的語法書即將完成。這部著作將為傳教士們解決不少疑問，甚至語言學校中的學生也可以使用它。因此，我認為掌握文言文並不是漢學家的“獨門絕技”，傳教士們也會從中受益匪淺。當他們將來在傳教區開始工作時，就能夠理解文言文知識在其中的重要性了。²⁹

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來對待漢語，是閔宣化一直秉持的原則，《熱河方言文法》是其在華 22 年來研究熱河口語的集成之作。他不僅自行設計符合荷語發音規律的漢語拼音，而且在語法闡釋上大量採用鮮活實用的例句做為輔助，成為當時在華聖母聖心會傳教士人手一冊的漢語指南。這些數量龐大、內容充實的生活語料更成為今日學者考察百年前熱河方言的一面鏡子。閔宣化同樣堅信，白話固然重要，但文言卻是中國人的靈魂。中國人對文人、先賢的推崇，讓古代經典成為中國哲學思想的核心。因此，他不為當時盛行一時的“白話運動”所動，堅持推動聖母聖心會內文言文的學習。1946 年問世的《古文原則》，是閔宣化多年文言文教學的經驗總結。這本以拉丁語法體系闡釋文言文的著作，讓荷語漢學界對古代漢語有了全新的認識。

毫無疑問，《熱河方言文法》和《古文原則》兩部著作，是閔宣化經過數年的學術積累而凝結出的研究成果。它們的問世不但開啟了以荷語撰寫漢語語法的里程碑，而且較為全面地展現了閔宣化對漢語口語和文言兩方面的總體認識。然而，以小語種撰寫的漢語語言學著作，因使用者不多，流通渠道不廣，在浩瀚的西方漢學著作中很容易被掩蓋和遺忘，但這些鮮為人知的研究成果並不意味著其學術價值不堪與同類著作相媲美。閔宣化的《熱河方言文法》與《古文原則》是兩部學界應深入研究的荷語漢語著作，其學術影響力不僅在長時期內帶動了整個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方向，也成為 20 世紀比利時、荷蘭漢語語言學科得以發展的一塊基石。³⁰

五、結語

作為 19 世紀末與中國交往最為頻繁緊密的比利時傳教團體，聖母聖心會不僅把西方的信仰、文化和現代知識帶入東方，同時又作為一種“輸出”媒介，把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歷史傳統帶回了地球另一端的比利時，成為歐洲社會和當地民眾認識這片遙遠東方國度的橋樑。聖母聖心會在漢語教育上的發展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利時社會對中國認識的進步。從早期的“隔山看海”到後期的“潛心研究”，這些演進並不是偶然的，閔宣化在其中的角色和發揮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他的出現，對整個聖母聖心會的漢語教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更新。在其三十餘年的教學生涯中，培養出了數百位來華傳教士。閔宣化一貫提倡的“文言是白話的根基”、“漢語語法的重要性”、“以真實

語料為基礎”等觀點成為聖母聖心會——這所 20 世紀初期“歐洲最大漢語學校”的學習導向。自 1939 年起，閔宣化執掌烏特勒支大學漢學系，把荷蘭以往偏重於閩南方言的教學傳統向北方官話的方向推進，其漢語觀也隨之被帶入了荷蘭的漢語教學體系中。在他的培養下，其學生艾樂希爾斯 (Daniel Ellegiers) 在 1959 年 10 月 23 日被任命為根特大學 (Universiteit Gent) 漢語言和文學教授，比利時歷史上第一個漢學教席也隨之誕生。我們不妨可以說，閔宣化對漢語語言的研究，不但帶動了整個 20 世紀的聖母聖心會，而且他的學術成就也催生了比利時的漢學專業，使其成為該領域裡名副其實的“鼻祖級”人物。

①1870 年 5 月 1 日，聖母聖心會在布魯塞爾近郊的司各特 (Scheut) 建造了自己的第一座新修院。一塊刻有拉丁文“中國苗圃”(Seminarium pro Sinis) 的石碑作為該修會的“座右銘”放置在了這座修院入口的大門之上。由此，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士也被俗稱為“司各特傳教士”(The Scheut Fathers)。關於聖母聖心會的創立過程及入華經過，參見鄭永君：《來華聖母聖心會及其荷語漢學家閔宣化(1886-1976)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 年。另，在 19 世紀末的中國，除了來自聖母聖心會的弗拉芒籍傳教士以外，還有來自比利時方濟各會聖若瑟省會的傳教士。1872 年至 1940 年間，共有 102 位該會傳教士在湖北西南地區 (亦稱鄂西南宗座代牧區) 活動，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弗拉芒籍傳教士。關於該修會在中國傳教活動的專題研究，參見 Carine Dujardin, *Missionering En Moderniteit: de Belgische Minderbroeders in China 1872-1940*, Leuven: Universitaire Pers Leuven, 1996.

②南懷義在創會初期就有秉持該修會比利時籍特色的想法，此舉曾遭到鄰國荷蘭天主教徒的質疑。南懷義在 1863 年 12 月通過荷蘭報紙對此做出了圓滑的解釋：“這個向中國傳教的比利時團體並不具有單一的國籍特色。我們將非常高興能夠接受與我們有同一語言和生活習慣的荷蘭神職人員入會”。然而不難看出，南懷義雖然避免聖母聖心會士在國籍上具有排他性，但仍然強調入會者“與比利時人語言和生活習慣相同”這一前提。相關研究顯示，至 1955 年為止，來華聖母聖心會士比利時籍者佔 86%，荷蘭籍者佔 12%。參見 Harry Knipschild, *Soldaten van God: Nederlandse en Belgische priesters op missie in China in de negentiende eeuw*, Amsterdam: Bakker, 2008, p. 62; Wei-Ying Ku, *Some Observations on CICM in*

China, 1865-1955: life of 679 Scheutists, i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eds.,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 unveiling some less known sources, sounds and picture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 U. Leuven, 2015, pp. 523-548.

③韓默理 1866 年 2 月在黑水地區馬架子寫給南懷義的信中提到漢語的重要性。參見 Jos Mullie, *De Studie van het Chineesch in de Congregatie van Scheut, Wetenschappelijke Tijdingen*, vol. 5, no. 9 (1940).

④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在其《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的“緒論”中提到：“沒有一種學術的領域比漢學更廣的了。從前不過經傳教士跟外交家‘愛美的’(amateur)，做了一陣……至於語言學方面，因為表面的乾燥，缺少引人的地方，所以沒有鼓勵其同樣的興趣，這是無足怪的”。其中“愛美的”是諧音詞，指的就是“業餘者”。參見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⑤《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原文為法文，題為 *Les anciennes villes de l'empire des grands Leao 大遼 au royaume Mongol de Bārin*，1922 年發表於法國東方學刊物《通報》。該文由馮承鈞翻譯成中文並於 1930 年在商務印書館以“尚志學會叢書”的形式首次發行中譯單行本，書名為《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1933 年再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華書局分別於 1956 年、2004 年兩次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2014 年再次出版發行。《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被譯成中文的閔氏單行本著作。

⑥Jozef Mullie, *Phone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nordpekinischen Sprachlaute*, *Anthropos*, vol. 8, no. 2/3 (1913).

⑦Jos Mullie, *De Studie van het Chineesch in de Congregatie van Scheut*, p. 194.

⑧第一次把漢語帶進比利時大學課堂是在1900年。當時根特大學(Universiteit Gent)的佛教研究(Buddhist Studies)教授德·拉·瓦萊·普桑(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把中文開設為一門選修課,以輔助學生研讀佛經文本。參見Mieke Matthyssen, Bart Dessen: *China in Belgium: From a religiou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Chih-Yu Shij, Peizhong He, Lei Tang, eds., *From Sinology to Post-Chineseness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a / UK: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Paths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9, p. 45.

⑨聖母聖心會當時用的《一目了然》並非是盧慧章1892年在廈門出版的切音字教材《一目了然初階》,而是徐家匯書館1878年印刷出版的要理書籍,另一本《古經略說》由方濟各會顧立爵(Eligius Cosi)撰寫,在1886年於河間府勝世堂出版。這兩本書今仍藏在南懷仁研究中心的圖書館內。

⑩Jozef Mullie, *In memoriam eerwaarde pater Antoon Mostaert (10 augustus 1881 - 2 juni 1971)*, Brussels: Jaarboek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letteren en schone kunsten van België, 1971, p. 412.

⑪閔宣化並沒有對那時所使用的《官話指南》有更多介紹。該書可能是由吳啟太、鄭永邦編撰的《官話指南》。該書陸續出版了北京官話版本、南京官話版本和方言版本等諸多版本。最早的《官話指南》(四卷)出版於1881年12月,其後文求堂在1903年出版了修訂版,修訂者是金國璞。參見張美蘭:《〈官話指南〉及其四種方言對譯本的價值》,福建廈門:《國際漢語學報》,2016年第1期;Jos Mullie, *De Studie van het Chineesch in de Congregatie van Scheut*, p. 194.

⑫這套由上海土山灣出版的《國民學校國文新課本》共八冊,現藏於魯汶大學遠東圖書館。據館員所述,這套書籍起初由聖母聖心會魯汶會院保存,有多個版本,其中最早的版本是1913年的第二版,最晚的版本是1935年的第九版。

⑬Willem A. Grootaers, *oude banden tussen Vlaanderen*

en China, *De Vlaamse linie*, no. 2 Sept. (1949).

⑭Jos Mullie, *De Studie van het Chineesch in de Congregatie van Scheut*, *Wetenschappelijke Tijdingen*, vol. 5, no. 9 (1940).

⑮1930年3月13日,閔宣化在承德(熱河)寫給省會長(Pater Provinciaal)的信。參見Archive Nr.: BE/942855/1262/5513 (KADOC18-722), Documentatie - en Onderzoekscentrum voor Religie, Cultuur en Samenleving (KADOC), K. U. Leuven.

⑯聖教雜誌社:《國文新課本說明書:第三四編》,上海:土山灣慈母堂,1918年,第1頁。

⑰Archive Nr.: BE/942855/1262/5516 (KADOC17-68), Documentatie - en Onderzoekscentrum voor Religie, Cultuur en Samenleving (KADOC), K. U. Leuven.

⑱Mullie Jozef, *Notions élémentaires de phonétique et alphabet général*, Changhai: La presse orientale, 1922.

⑲Mullie Jozef, *Drie sinologische bijdragen - 1. De Nederlandse romanisatie van het Chinees; 2. De akkusatieven in het Chinees; 3. De dubbele nominatief of het volzin-gezegde in het Chinees*, Leuven: Vlaamse drukk, 1946.

⑳Jozef Mullie, *De 214 sleutels van de Chinese karakters*, Leuven: Dewallens (no date).

㉑該書全名為《中國公函、詔令、奏議、覺書、碑文等文選》(*Choix de documents, lettres officielles, proclamations, édits, mémoriaux, inscriptions : texte chinois avec traduction en français et en Latin*), 1894年由獻縣天主堂印書館(Ho Kien Fou,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印行。

㉒W. South Coblin, Paul L-M. Serruys, C.I.C.M. (1912-1999), *Monumenta Serica*, vol. 47 (1999).

㉓《邪正理考》(*De veris et falsis*)是西灣子教區華籍神父張雅各伯(Jacob Tchang, 張維祺)的首部漢文專著,1907年由聖母聖心會經營的西灣子印書館出版。1911年至1941年間,該書又由上海土山灣印書再版八次,總銷售量達七萬餘冊,可見其受眾之廣。全書共計五百餘頁,分為五卷,其內容屬於“護教學”(Apologetics)的範疇,以儒釋道及中國民間信仰與基督信仰相對比,以求闡釋天主教信理的合理性。《邪正理考》最大的特點則是通篇以“口外方言”寫成,用平實無華的“白話文”來擴大讀者範圍。作者在文中

旁白處又為生僻字“注音”或“注義”，因此該書不僅在中國底層民眾之間易於誦讀流通，也成為西方傳教士學習中文、了解中國地方信仰的良好教材。關於張神父的生平介紹，參見隆德理 (Valcer Rondelez):《張雅各伯神父傳》，載古偉瀛主編:《塞外傳教史》，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02年;關於《邪正理考》的文本介紹，參見 Taveirne Patrick, Father Jacobus Zhang Weiqi (1856-1935): An Analysis of De Veris et Falsis (邪正理考 1907), in Rachel Lu Yan, Philip Vanhaelemeersch, eds., *Silent Force: Native converts in the Catholic China Mission*,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 U. Leuven, 2009.

②關於對早期“白話報刊”的介紹，參見劉光磊、孫堉:《白話報刊對白話文運動的影響》，浙江寧波:《寧波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③以上對閩宣化中文課程內容的闡述，整理自1930年3月13日，閩宣化在承德(熱河)寫給省會長的信。參見 Archive Nr.: BE/942855/1262/5513 (KADOC18-722), Documentatie - en Onderzoekscentrum voor Religie, Cultuur en Samenleving (KADOC), K. U. Leuven.

④魏達恒1940年3月9日在奈梅亨寫給閩宣化的信。參見 Archive Nr.: BE/942855/1262/5515 (KADOC18-3388), Documentatie - en Onderzoekscentrum voor Religie, Cultuur en Samenleving (KADOC), K. U. Leuven.

⑤Jozef Mullie, *Korte Chinese spraakkunst van de gesproken taal (Noord-Pekinees dialect)*, Utrecht: Spectrum, 1947, voorwoord, p. 4; 關於閩宣化《中國語初範》的研究，參見鄭永君:《閩宣化及其〈中文口語文法概要—北京以北方言〉(1947)研究》，廣州: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⑥Mullie Jozef, *Het Chineesch taaleigen: inleiding tot de gesprokene taal (Noord-Pekineesch dialect)*, Pei-T'ang: Drukk. der Lazaristen, vol. 1, 1930, voorwoord, p. 5.

⑦閩宣化的鉛印手稿 (letterkundige taal of volkstaal) 參見 Archive Nr.: BE/942855/1262/5513, Documentatie - en Onderzoekscentrum voor Religie, Cultuur en Samen-

leving (KADOC), K. U. Leuven.

⑧1939年，閩宣化被荷蘭國立烏特勒支大學 (De Universiteit Utrecht) 特聘為漢語教授，這是荷蘭設有漢學專業的兩所大學之一，其教席初次設立於1933年，由費妥瑪 (Thomas T. H. Ferguson) 擔任。作為費妥瑪的接班人，閩宣化不但在該校主掌講席長達17年之久 (1939~1956)，而且又是首位以比利時籍兼天主教傳教士身份擔任此教職的人。另一所設有漢學專業的荷蘭大學是萊頓大學 (De Universiteit Leiden)，該校在1877年任命施古德 (Gustaaf Schlegel) 為首位漢語教席，是荷蘭漢學專業學科建立的始創者。荷蘭漢學專業建立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於該國在荷屬印尼 (今印度尼西亞) 的殖民政府，大量生活在印尼的閩南、客家籍華工是該荷屬殖民地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因此學習閩南和客家方言是荷蘭漢學系的主要內容。直到1930年代末期，荷蘭在漢語言的研究方向才開始逐漸轉向國語白話文。這時，精通北方官話的閩宣化成為接任烏特勒支大學漢學教席的合適人選；而同時期的萊頓大學，則由荷蘭駐華大使館原漢語翻譯、同樣熟識北方官話的戴聞達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 擔任。在烏特勒支大學執教期間，閩宣化所使用的的基本是他自己編寫的教材，即《中國語初範》和《古文原則》。這兩本著作為國語白話文和文言文在荷蘭的漢語教育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閩宣化雖然在荷蘭執教，但他在1949年之前並沒有放棄在聖母聖心會魯汶神學院裡教授漢語的工作。參見 Rint Sybesma,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in Rint Sybesma, Wolfgang Behr, Yueguo Gu, Zev Handel, C.-T. James Huang and James Myers, eds.,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eiden, Brill, vol I, pp. 537-743.

作者簡介：鄭永君，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責任編輯 陳志雄]